

· 语言文学艺术研究 ·

## 《礼记》伦理哲学的诗学旨趣

徐宝锋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 100083)

**摘要:**《礼记》是一部对于中国士人的精神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儒家经典。把《礼记》作为一个系统文本予以整体探究,以一种宏观的诗性视角敞开《礼记》所包蕴的儒家早期伦理世界,而非断章取义、纠缠于单一的伦理或者诗学观念,有助于藉此探寻中国士人的原型精神,进而深入思考出早期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产生发展以及演变轨迹,从历史纵深和横向发展的角度透视儒家的精神境界以及诗性人格建构。

**关键词:**《礼记》;伦理;文化诗学

**中图分类号:** B232;I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分类号:** 1674-7089(2011)03-0126-04

儒家<sup>①</sup>哲学<sup>②</sup>是一种具有独特的情感审美特质的伦理哲学,是一种立足于现实而指向乌托邦的张力平衡哲学。从春秋末期开始,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大转折的时代,周天子的地位逐渐式微,自下而上的变革时有发生。西周以来,作为社会基础的宗法制社会结构出现了松动,并逐渐呈现出分化解体的趋势。社会结构领域的变化带动了意识形态的革新,原有的宗法制度规约之下的关乎人性的一些原初欲望开始被释放出来,并逐渐从无意识状态过渡为现实意识的主导。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的变动带来的不只是政治上的震荡,更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变革。首先,儒家希望通过“克己复礼”最

终使人达到“反本复始”的理想状态,但这种理想状态只能在儒家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诗性同构中完成;其次,儒家虽然一直希望获得超越的拯救姿态,但却无法摆脱宗法血缘背景下伦理问题的现实指涉,这造成了儒家诗性的痛苦;第三,“孝”一直是宗法社会结构体系下伦理问题的核心,是人格建构和族群塑成的情感基础,它使羁绊于现实伦理问题的儒家哲学思辨具有了丰富的情感附加值。这种情感附加值的域已远远超过了思辨本身。这种由“礼崩乐坏”所引起的价值观念的变革促进了儒家伦理哲学意识的勃兴<sup>③</sup>而且这种哲学意识的勃兴从一开始就是诗性的。成书于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礼

收稿日期: 2010-12-20

作者简介: 徐宝锋,男,河北承德人,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国际汉学、中国文化与诗学研究。

① 本文所指涉的儒家范畴,如无特别说明,均指汉及以前的早期儒家。

② 平静的宗法社会的解构促进了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促进了超越性的思辨精神的完善与发展,这种思辨使儒家处于一种融过去、当下和未来于一个连续的哲学复合体中。

记》是体现这种哲学特质和倾向的重要儒家经典。<sup>①</sup>

《礼记》较为完整地展现出了儒家伦理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幅面。作为纵贯战国秦汉时期的儒家伦理哲学之集大成者，《礼记》不仅涵盖了孔子、子思、孟子、荀子以及其他七十子及其后学的伦理哲学思想，而且涉及了汉代的一统思想和阴阳五行观念。<sup>②</sup>“《礼记》是一部儒学杂编，里面包含的儒家思想史料相当丰富。研究早期儒家的思想，需要读《论语》；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儒家思想，就不能不读《礼记》了。读《论语》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确立，读《孟子》、《荀子》、《礼记》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发展。”<sup>③</sup>《礼记》蕴含的丰富的辩证逻辑和本体论诗学思想，已经成为解读战国至秦汉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士人精神世界的一把钥匙。

从社会伦理生活中实用性的细仪末节，到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度的精神，再到儒家对于社会人生以及人格修养的一系列见解和态度，《礼记》把外层的社会理想和内在的人格完善有机地统一在具体的伦理形象之中，从不同层次和角度展现出了儒家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之间的矛盾张力，相当透彻地抒写出了儒家伦理哲学的乌托邦特质。例如，《大学》、《中庸》、《儒行》体现了儒家修身做人的人生哲学理想，《礼运》展示出儒家的社会理想，表达出了儒家对于美满而公正的社会的强烈向往<sup>④</sup>，《学记》和《乐记》从教育理论和音乐理论方面谈及了社会理想实现和理想人格完善方面的功夫路径，《曲

礼》、《内则》、《少仪》诸篇则通过记录生活上的细小仪节，描摹出了古代贵族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关系。

从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人格建构所起作用大小来看，《礼记》仅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而远远超过《荀子》。长期以来，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一直把利用以礼治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为，作为维护统治秩序从而获得长治久安的重要的大政方针。《礼记》因此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并被最终推上经典地位，进而成为几千年来对中华民族产生重大影响的儒家经典。<sup>④</sup>

《礼记》一书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首先是肌质形象层。《礼记》一书由各种各样具体礼仪的描述和形象分析组成，其中包含了很多栩栩如生的生活场景、典礼仪式和活灵活现的现实人物。这构成了《礼记》一书的基本符码。其次是理念意义层。《礼记》比较清晰地体现了早期儒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儒家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以及儒家在现实理想和个人理想的矛盾张力中凸现的哲学思索和政治抱负。这构成了《礼记》一书的内在精髓。当前对于《礼记》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在于，要么抽走了《礼记》的内在精髓，做一种超离于文本之外的形而上学断分析，完全抛弃或忽略了《礼记》一书作为生命质的形象符码躯体；要么单纯捡起某些碎落的符码，只做一种肌质的考古学研究，不能还原《礼记》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结合该书的精神内核予以把握。取其毛而弃其皮或者尽去其毛仅存其

① 关于礼的起源以及《礼记》的成书过程，前人已经作了详细考证，王鐔在其博士论文《〈礼记〉成书考》，刘丰在其博士论文《先秦礼学思想及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金尚理在其博士论文《礼宜乐合的文化理想》，杨志刚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先秦礼文化史要论》中都分别作了学术史的回顾，比较有代表性，本文不再赘述。

② 关于《礼记》成书，《汉书·艺文志》载有：“《记》，百三十一篇。”其下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长期以来通行的说法是，《大学》为曾子所作，《中庸》为子思所作，《学记》集中体现的是荀子的思想，《月令》、《明堂位》、《乐记》为汉代作品。其他多数作品为孔门七十子后学所作。

③ 《礼记·礼运》比较形象地展现出了儒家理想中“大同”社会的理想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④ 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杂编上升为泱泱大国的一部经典，到了唐代，和《左传》一起被列为大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必修课程之一，宋代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和《论语》、《孟子》并置为《四书》，到清代，《礼记》则完全取代《仪礼》而成为五经之一。《礼记》对于中华民族精神人格建构的重要影响从中可见一斑。

皮的分析都不会得出对于分析对象准确而实在的结论,要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sup>[2]</sup>，“虎豹无皮，而鞴同犬羊”<sup>[3]</sup>，任何片断式的割裂性研究都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诸多论者从不同的角度发掘了《礼记》部分篇章所蕴含的诗学思想，得出许多颇具学术价值的结论。但是，如果想全面准确把握战国至秦汉这一漫长历史时期的儒家诗学思想，就应该以一种历史的眼光，把《礼记》作为一个系统文本予以整体探究，这样才不会断章取义，纠缠于单一的诗学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够以一种宏观的诗学视角敞开《礼记》所包蕴的儒家早期伦理世界，并由此探寻中国士人原型精神的重要源头，深入思考出早期中国传统诗学思想的产生发展以及演变轨迹，从历史纵深和横向发展的角度透视儒家的精神境界以及诗性人格建构。

## 二

文化诗学方法论的主轴是文化研究与诗学研究方法的融合贯通，努力实现研究旨趣和认识论指向相一致。在《礼记》诗学问题研究中融入鲜明的文化整体观和本源观，实现文化整体观及文化诗学在认识指向上的本源观适应，超越某一种研究方法的局限，实现方法论上的综合性将十分有助于在文化系统中的特性“区域”对《礼记》诗学思想做出新的准确描述。

李春青教授认为，以一种文化诗学的视角切入对于儒学的研究可以“真正弄懂古人究竟是如何思考和表述的，其与我们究竟有何差异，然后用描述的方式而不是命名的方式尽可能地呈现出古人本来要表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再运用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话语形式对其进行分析与阐发，也就是要建立一种中介，从而使古人的话语与现代的话语贯通起来。”<sup>[4]</sup>笔者认为，在对于《礼记》诗性伦理世界的研究中，应该将诗学话语与儒家文化编码平行并置于中国士人的

人格精神建构中加以考察，找寻出两者间的互动和相通之处，进而探究出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在诸多文化想象中发掘诗性的闪光，揭示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所蕴含的丰富的诗学观念；应该通过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社会文化内容所蕴含旨趣的阐释，寻觅出礼学与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

从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方面来看，倚借于文化积存和中国士人精神建构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礼记》诗学的蕴涵的研究视角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通过对于《礼记》伦理文化形态的诗性研究可以对早期的儒家诗学观念进行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在这里使用的“诗性”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礼记》有牵涉的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礼记》影响中国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礼记》影响下形成的早期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诗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中国诗学早期的价值旨趣。通过阐述早期儒家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礼记》的诸如“中”、“和”、“诚”、“时”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讨论早期儒家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礼记》对早期儒家诗学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通过对礼乐象征性节仪的诗性分析，描述出他们背后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蕴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早期儒家的文化精神和伦理哲学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我们会完成在《礼记》诗学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伦理哲学和文化精神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诗学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和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最大可能地实现《礼记》文化与诗学问题的自治。

## 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sup>①</sup>，在某种意义上说，重塑历史想象力<sup>②</sup>，以文化诗学的视角不断敞开《礼记》洋溢儒家丰富而矛盾的诗性精神的伦理世界，不论对于解读中国士人千年来积淀下来的人格基因符码，还是形成辩证思考历史传统的文化诗学观念，都是颇具现实意义和操作价值的。

对于《礼记》诗学问题论析的基础首先在于一种文化的整体观。儒家一直是将诗与道德相对照，将艺术活动与自然活动、政治活动等相比较来发现的。从《礼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的行为、心理、道德、艺术等范畴的相互贯通，发现不同文化范畴或活动方式中的某些相通之处。把《礼记》辑录的儒家伦理哲学和文化精神看作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整体，通过对这种文化不同的形态表征，各部分之间既自成体系（如文学、美学、音乐；礼仪、社会、伦理；服装、饮食、建筑……），又以各种直接或隐在的方式进行着相互的联结和作用的深入分析，在文化整体的理论视野下，诗性地敞开

封闭的《礼记》文本系统，使之成为一个与礼仪、伦理、社会、道德等文化范畴相互联系的文本，以对于《礼记》的整体文化观来观照其所蕴涵的诗学思想可以使之越来越清晰和系统。其次，以文化诗学的“本源观”为认识指向，在《礼记》复杂文化系统的视野中对儒家诗学的特性和性格架构进行本源性的观照，通过把儒家诗学思想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表征置于《礼记》文化系统的结构之中进行诗学内质的综观，可以实现儒家伦理哲学思想的特性和本性的一种诗学与文化的综合复归。在《礼记》自洽的文化整体中，通过哲学思辨来论证艺术事实及艺术的特殊性，这样才能真正超越于方法之争，去接近诗学的本源性问题。

## 参考文献：

- [1] 王文锦. 礼记译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01：5.
- [2] 杨伯峻，编注. 春秋左传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90：348.
- [3] 周振甫，译注. 文心雕龙选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80：20.
- [4] 李春青. 文化诗学视野中的古代文论研究[J]. 文学评论，2001，(6).

## Poetry Idea of Liki's Ethical Philosophy

XU Bao-fe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Liki is a Confucian classic which has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r's mentality in China. To grasp the primitive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War period to Qin and Han dynasty and look into Confucian ethical world described in Liki, we must adopt a cultural poetry study vision to treat Liki as a unique systemic text, but not limited to a study of pure ethical methodology or a one-sided account on poetry issues. With a full scope study of Liki with a cultural poetry methodology, we can ponder 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idea and the Confucian thoughts in a historical timeframe and macroscopic aspect.

**Key words:** Liki; ethics; cultural poetry

〔责任编辑：渠红岩〕

① “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是意大利学者克罗齐1917年提出的一个著名命题。1947年1月，朱光潜先生在《克罗齐的历史学》论文中探究克罗齐的史学思想时，曾对这一命题做了如下阐发：“没有一个过去史真正是历史，如果它不引起现实底思索，打动现实底兴趣，和现实底心灵生活打成一片。过去史在我的现时思想活动中才能复苏，才能获得它的历史性。所以一切历史都必是现时史……着重历史的现时性，其实就是着重历史与生活的联贯。”

② 我这里所指的历史想象力范型，是指通过修正我们对于儒家文化原初形态理解的缺失，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融入历史情境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儒家原初社会形态中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